

中国经济问题思考

人包产到户

RENMIN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徐勇/著

沉浮录



珠海出版社

包产到户 沉浮录

徐 勇/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产到户沉浮录/徐 勇著
ISBN7-80607-384-1 ¥19.80元

I 包…
II 徐…
III 中国-纪实-包产到户
IV I25

中国经济问题思考书系

包产到户沉浮录

作 者■徐 勇

选题策划■雷良波

终 审■成 平

责任编辑■雷良波

封面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社 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层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广东韶关粤北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3 字数▲250千字

版 次▲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册

ISBN 7-80607-384-1/I·188

定 价▲1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引 言

民以食为天。

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历代王朝有鉴于此，都不得不以农为本，唯恐江山不固，天下难平。

在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且以温饱为主要目标的国度里，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支配社会运转的最基本问题。

以“乡村建设运动”而闻名于世的梁漱溟先生为此曾善意地提醒刚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切莫在革命胜利后忘了农民，乃至情绪化地认为农民生活“九地之下”。梁先生情绪化的责难激怒了同为湖南老乡、在延安窑洞曾与梁彻夜放谈中国前途、如今已成为执政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颇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也情绪化地指责和嘲讽：难道你梁先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

的确，依靠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向高度重视农民问题，且有深刻的认识。在西方

现代化理论看来，农民只是“历史的弃儿”。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将“弃儿”视为历史的巨大动力，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的现代化开启了大门。正如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所评价的：“在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他们为最终摧毁旧秩序提供了炸药。这里，农民再次作为主要动力推动一个政党取得了胜利。”^①

然而，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和处理农民问题上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依靠属于传统力量的农民的支持。特别是随着天下由乱到治，人口激增，工业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翻身得解放的亿万农民要走出传统的窠臼，奔向富裕文明的现代社会，实现革命性转变。而这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新的动员和组织方式，再次充分激发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其历史主动作用。

为此，革命胜利不久，中国共产党人便及时果断地选择了将亿万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的集体化之路，并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实现了这一目标。然而，如何在整体上仍为手工劳动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对集体农民的有效动员和组织，充分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却成为一个极富中国特色且长期困扰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问题。

中国农民以其独特的实践理性精神，中国共产党人

^① [美]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以其尊重实践，尊重农民群众的作风和胆识，探索出承包责任制这一崭新出路。

遗憾的是，承包责任制自问世推行之日起，就因为带有种种传统色彩而遭受到被批判、被压制的厄运，并被上升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斗争焦点之一的吓人高度。十年“文化大革命”巨大历史悲剧的理论起因——1962年中共北戴河会议对阶级斗争形势估量便与农村出现“包产到户”且得到相当部分中共高层领导人支持密切相关。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内不同意见争论最激烈、时间最长的问题，莫过于“包产到户”。由此产生的尖锐分歧和政治高压所造成的是农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严重后果。1957年到1978年20来年时间里，农民收入仅增长年均2.9元钱！

有人说，在革命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处理农民问题和进行阶级斗争两个方面尤为高明，革命后却在这两个最为熟悉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失误。梁漱溟先生当年的忧虑不能说是多余的。

当历史遭到不应有的重重阻力时，必然会以其固有的韧性为自己寻求出路。尽管农村承包制反复受到批判压制，成为不可逾越的禁区；尽管因主张“包产到户”而命运多艰，甚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难以计数，以致人们谈“包”色变，但一旦左的锁链稍有松动，它就会如野火后的春草，顽强地在广阔的原野上生长起来，直到1979年遍及全国，形成颇具创造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多次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自农村始。

但当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的农村改革兴起之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成为第二次革命的突破口。如不是刚经历大灾大难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及时支持和引导，说不定会再次遭受灭顶之灾。

当一个事物普及后，人们往往会忽视其独特价值。如今农村承包责任制已深深植根于中国大地，人们也许会淡忘围绕农村承包责任制所进行的长达近 30 年激烈论争的风风雨雨。

回顾与反思这段风雨历程，对于今日改革开放不再纠缠于姓“资”姓“社”的无谓之争，不再动辄上纲上线轻易扼杀富有生命活力的东西，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不拘泥恪守本本教条的实践理性精神，大有裨益。

刘少奇:搞人民公社是一种试验,搞包产到户也可以是一种试验嘛。

陈云:用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

邓小平:安徽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再试试看。

毛泽东: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

邓子恢:政治挂帅不是万能的,中国农民是现实主义者,中国总有一天要实行按户承包责任制。

万里: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邓小平:农业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我们把改革当作是第二次革命。改革从农村开始。



目录

引言

● 第一章

合作化高潮中邓子恢首倡包工包产

- 两个积极性：正确的出发点/3
- 集体经济非有责任制不可/7
- 合作化速度之争的冲击/14
- 包工包产势在必行/19

● 第二章

反右前后包产到户的崛起与夭折

- 新农民纷纷试行包工包产/27

- 浙江永嘉包产到户“前哨站”/30
- “好得很”与“糟得很”之争/33
- 邓子恢总结经验提出“三包”/40
- 反右大辩论对包产到户的批判/44

● 第三章

庐山风云变幻中的包工包产到户

- 历史的惯性：包工到户的持续/57
- 人民公社也需要有责任制/60
- 包产到户的百日试验/66
- 反右倾斗争再加讨伐/72

● 第四章

灾难中安徽兴起“责任田”

- 大饥荒降临后的应急对策/85
- 曾希圣积极试验“责任田”/89
- “通天了”：毛泽东允诺可以试验/97
- “责任田” = “救命田”/103

● 第五章

困境下胡开明力主“三包到组”

- 上下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109
- 胡开明在塞外的思索/115
- 排众议：把核算单位放到“脚”上/119

· 上书毛泽东：推行“三包到组”/123

● 第六章

包产到户的命运再次逆转

- 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及毛泽东的态度/131
- “责任田”的紧急刹车/136
- 为“责任田”叫好的抗争/141
- 几个小人物为包产到户奔走呼号/149
- 高层领导对待包产到户问题的意见分歧/155
- 北戴河会议形势急转直下/170
- 对赞同“包产到户”代表人物的批判及组织手术/176

● 第七章

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愈演愈烈

- 四清运动挖“单干风”的社会根源/189
- 反修防修：毛泽东批“三自一包”/192
- 包产到户的清除与农业学大寨的兴起/198
- “文化大革命”对“三自一包”的剿灭/203
- 政治高压下的探求与“偷生”/209

● 第八章

政策松动下安徽兴包

- 左根未除农业出路难寻/217
- 万里放宽农业政策的效应/220
- 口子越开越大：“包”字急不可待露头/227

- 包产到户刚冒头的强烈反响/230
- 西部四川的遥相呼应/234

● 第九章

承包制脱颖而出的是是非非

- 历史转折的起跑点/241
- 从小岗“黑会”到承包制四处开花/247
- 两封《人民日报》读者来信的较量/254
- 从“不许”到“不要”：决策层的松动/261
- 新矛盾新问题：实践的徘徊/266
- 四面楚歌压力下的丰收喜悦/273

● 第十章

大突破：包产到户引发的大争论

- 给包产到户报个户口/285
- 围绕包产到户性质的论争/293
- 邓小平表态与中央的明确说法/301
- 阳关道与独木桥：为包产到户公开叫好/308
- 包产到户的突破性进展/314

● 第十一章

大普及：再破“发达地区不许包产到户”的禁区

- 自上而下的自觉推进/321

● 第十二章

**承包制的总结、完善、稳定
及效应**

- “发达地区不许包产到户”的中梗阻问题/330
- 边远落后地区向中心发达地区扩展/338
- 深化与创造：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351

- 三个1号文件及承包制的扩展/361
- 人民公社解体与“农村包围城市”/376
- 从历史制高点看家庭联产承包制/383
- 新挑战新问题：承包制的稳定和发展/393

.....
后记
.....

第一章

合作化高潮中邓子恢首倡包工包产

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土地改革后农民的两个积极性，一是个体经济积极性，一是劳动互助积极性。只有注意到这两个积极性，才能推动农村集体化的正常发展。因此必须重视集体化过程中的经营管理问题。比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是农村合作化时期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



▲两个积极性：正确的出发点

如果说土地是人类和财富之母，那么，农民的命运则和土地血肉相连。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祖祖辈辈不屈不挠追求和向往着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难以实现这一梦想。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而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以此唤起民众。不过，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只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全面实施。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在全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翻身解放了的农民终于获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土地。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民，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但这一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并没有改变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生产和经营规模狭小、分散，个体劳动、手工生产，社会联系狭隘、简单，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当小农经济的潜力得以最大限度发挥时，可以产生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那样的盛世。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也注定了中国始终难以走出封建社会的窠臼，只能在传统的框架内缓慢地行进。

对于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之中的社会

主义中国，小农经济的局限性更为明显。一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难以避免农村社会的贫富差别，直至两极分化。农民梦寐以求获得的土地有可能再次丧失。这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精神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二是小农经济难以扩大再生产，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剩余财富。而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人力将主要取自于农村。由此形成了小农经济广泛存在的现实与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尖锐冲突。

面对土地改革后这一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通过互助合作把千百年来的小农经济引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之路，将汪洋大海般的分散农民组织起来，成为社会主义集体新农民，以创造新的奇迹。农业合作化因此成为刚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所要着手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

然而，农业合作化毕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自然会出现中国共产党人从未遇到的新问题。特别是怎样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将一家一户农民组织到新的集体中去，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尤为不易。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曾被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样板的“老大哥”苏联的情况与中国的差别甚大。俄国长期保存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农村村社这一原始土地公有形式。根据这一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假如俄国革命能够实现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